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

第7卷

动乱后崛起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下

曾祥文 主编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第七卷

动乱后崛起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下）

主 编 曾祥文

编写人员 曾祥文 饶东辉

万 敏 孙泽学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第七卷

动 乱 后 崛 起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下）

主 编 曾祥文

责任编辑 蒋亮平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南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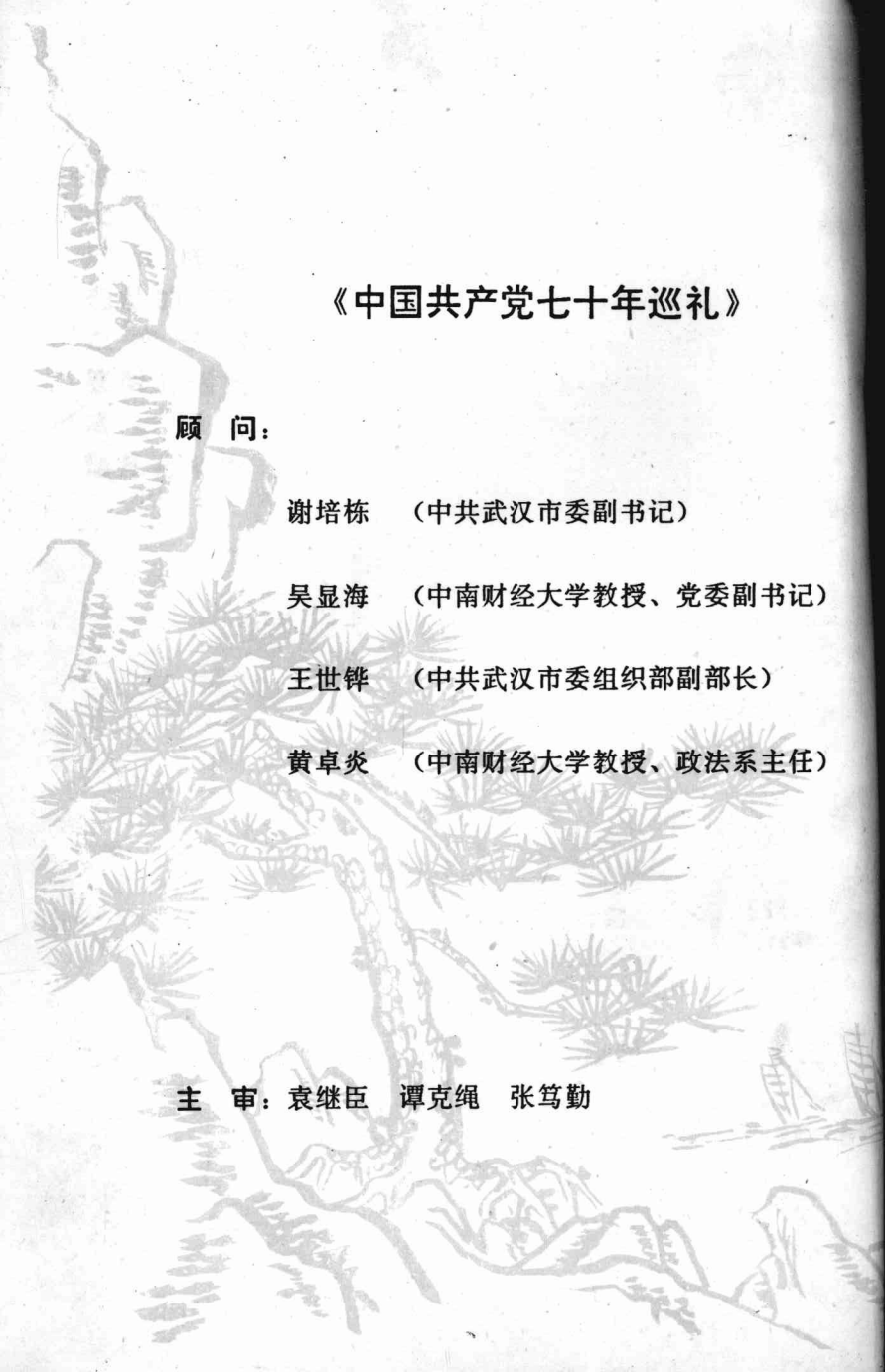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44 字数:15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629—0465—0/D·48

总定价:19.95元(本册定价:2.85元)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巡礼》

顾 问：

谢培栋 （中共武汉市副书记）

吴显海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党委副书记）

王世铨 （中共武汉市组织部副部长）

黄卓炎 （中南财经大学教授、政法系主任）

主 审：袁继臣 谭克绳 张笃勤

编 委 会

主 编：孙志军 范小方 李永铭 赵 莉

副主编：徐 健 王伟宁 王海林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伟宁 王海林 孙志军 陈祥林 李江波

李永铭 李娟丽 张小平 范小方 赵 莉

郭圣福 徐 健 曾祥文



目 录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山雨欲来..... (3)

《五·一六通知》..... (6)

驱逐工作组..... (9)

炮打司令部..... (12)

二、复杂严峻的局势

动乱席卷全国..... (15)

风暴中抗争..... (20)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27)

大联合与派性纷争..... (33)

“九大”的召开..... (38)

三、林彪集团覆亡

改造一切的“斗、批、改”..... (43)

林彪抢班夺权阴谋败露..... (47)

惊心动魄的“9·13事件”..... (53)

低谷时期的一线转机..... (59)

外交战线新局面..... (67)

四、粉碎江青集团

“批林批孔”与江青组阁阴谋破产.....	(73)
卓有成效的整顿	(79)
“四人帮”疯狂反扑.....	(82)
“4·5”怒吼.....	(87)
风雷激荡的十月	(91)
十年沉思	(95)

五、徘徊前进

揭批“四人帮”	(101)
“两个凡是”	(103)
真理标准大讨论.....	(106)
经济复苏与新失误.....	(109)

六、拨乱反正

历史的伟大转折.....	(113)
重申四项基本原则.....	(116)
全面平反冤假错案.....	(119)
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方针.....	(122)
千秋功过党评说.....	(125)
开创新局面.....	(128)

七、改革大潮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132)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138)
政治体制改革.....	(145)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150)

“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实践	(153)
--------------------	-------

八、多方位开放

告别闭关锁国	(158)
经济特区日新月异	(161)
沿海开放地带的形成	(163)
国际经济合作交流的扩大	(167)

九、走自己的路

初级阶段论	(173)
治理与整顿	(177)
六月的洗礼	(185)
扎根于群众之中	(189)

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演出了一幕幕骇人听闻的悲剧。历史在这里停滞了，倒退了。

诚然，这种倒退在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同中国共产党的辉煌业绩相比也只是一段插曲。但它毕竟是浩劫、是悲剧，我们永远不能忘却、也不应该忘却这段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经过严重的挫折和痛苦的反思，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终于走出了大动乱的泥潭，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

汹涌的改革大潮滋润着干涸的土地，绿嫩的新芽诉说着神州沧海桑田的巨变。清新的开放之风唤醒了沉睡的心灵，睁眼的雄狮追赶着时代一日千里的节奏。共和国的每一位公民，都会从自己或自己身边

所发生的一切，体验到历史前进的步履。

尽管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国内建设仍有曲折，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已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华民族正以昂扬的英姿走向二十一世纪。

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进步。不堪回首的岁月，使我们学会了许多，许多……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山雨欲来

1966年，新中国迎来了第十七个春秋。人们憧憬美好的未来，为开始实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忙碌着。然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飓风席卷神州，改变了历史的舵向，“文化大革命”把共和国引向了十年动乱的坎坷之途。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名批判了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谁能料到，正是这篇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的文章竟然拉开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的序幕。

姚文元的文章，捕风捉影地将《海瑞罢官》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说什么在我国遇到三年经济困难，帝修反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了一股“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单干的优越性，要求“退田”恢复个体经济。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觉得冤枉，希望有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为他们“翻案”抱不平，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

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文章措词之激烈，政治色彩之浓厚，远远超出了一般文艺批评的范围。

其实，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创作的。1959年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报喜不报忧的浮夸风，倡导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讲真话的精神。根据胡乔木的建议，吴晗写了一些有关海瑞的文章，其中《论海瑞》一文发表时，正值庐山会议结束。出于知识分子的谨慎小心，吴晗在这篇文章末尾还加上了一段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话。后来，他应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先生之邀，写了《海瑞》一剧，并接受友人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年上演后，饰海瑞的马连良受到毛泽东在家中的接见。《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斗争并无关联。

1962年以后，不甘寂寞的江青活跃起来。从1963年起，她以“文艺哨兵”的身份开始插手文艺工作，多次向毛泽东建议批《海瑞罢官》。1964年，与江青沆瀣一气的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是替彭德怀翻案。得到毛泽东的许可，江青先找中宣部和文化部，提出要批《海瑞罢官》，遭到陆定一、周扬的抵制，后又找了几个个人，也被婉言谢绝。1965年初，江青找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经介绍，便和臭味相投的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谋划，开始了批判《海瑞罢官》的精心之作。文章的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隐藏了8个月之久。

文章发表后，全国各报没有立即转载，后来陆陆续续登载了，但北京仍然没有反应，在长达19天的时间里没有转发姚文元的文章。康生、陈伯达授意关锋、戚本禹写出围攻《海瑞罢官》的文章，也被中宣部制止而未能发表。

在毛泽东看来，“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信号”，其背后隐蔽着他对中国是否会出现修正主义、是否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关注和担忧。60年代初，赫鲁晓夫在挑起中苏论战的同时，又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致使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对于来自列宁故乡的这一事态变化，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深忧虑和思考。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促使下，毛泽东的注意力越来越倾斜于抓阶级斗争，防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曾经尖锐地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号召各地起来造反，大闹天宫。中央第一线对姚文元文章的抵制，证明了他对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于是他尖锐地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他断言：全国的宣传工作我管不了了，北京市委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毛泽东决心通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来解决已存在于党内的路线问题和修正主义问题。

1966年2月3日，面对批判《海瑞罢官》已经发展起来的形势，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组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出学术讨论应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力图把学术批判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不赞成把学术批判变成严重的政治批判。《二月提纲》由刘少奇召集政治局常委讨论下发。几乎在同一时间的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断定，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

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中央将这个文件转发全党。《二月提纲》代表着政治局多数同志抵制过火批判运动的努力，《座谈会纪要》显示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决心。《座谈会纪要》的下发，表明《二月提纲》实际上被否定。

伴随着无可制约的政治批判，组织上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人事更替。在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同一天的11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以“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的罪名免去职务。12月，林彪诬陷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罗瑞卿阴谋“篡军夺权”，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对罗瑞卿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批判，然后将他从西南边陲视察地召回，予以隔离审查。1966年3月底，毛泽东批评彭真和陆定一，指责中宣部不支持左派，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如果再不支持，就要解散五人小组、解散中宣部、解散北京市委。党内斗争的这种异常现象和党外舆论界的过火批判互相呼应，构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政治气候。

《五·一六通知》

批判《海瑞罢官》点燃的文化革命之火，很快在全国熊熊燃烧起来，不过这时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

持，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按他事先安排进行的，并由康生负责请示汇报。

会议通过了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罗织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条罪状，指责《二月提纲》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学术争论，反对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通知》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违反实际的错误估计。认为60年代以来，在三里（党里、政府里、军队里）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十三个方面（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充满着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通知》要求高举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通知》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描述得一团漆黑，将一大

批党政军领导人视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似乎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党和国家危在旦夕。《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纲领。

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一方面别有用心地鼓吹个人崇拜，说：“毛主席是天才”，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另一方面又大讲政变，列举了古今中外许多搞阴谋、耍权术，烛光斧影、千古之谜的政变事例，无中生有地说党内有人要搞反革命政变，“现在已经在捣鬼”。扬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等等。林彪的讲话充满了杀气，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紧张空气。

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5月23日，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5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

会议决定撤销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谢镗忠、尹达、王力、关峰、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江青被任命为代理组长，陶铸被增选为顾问。不久，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因受迫害打击离开中央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落入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手中。《五·一六通知》的制定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标志着“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发展。“文化大革命”已开始进入全面发动的阶段。

驱逐工作组

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为了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付诸实践，把文字的批判变为行动的批判，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5月30日，派出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夺权，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宣传。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日晚，批准向全国广播经康生授意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在5月25日贴出的诬陷、攻击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诬蔑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京大学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要群众起来“彻底摧毁”。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